

熊十力别集 论六经·中国历史讲话

熊十力，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。湖北黄冈人。曾参加武昌反帝反封建运动。1929年入南京支那学院研究佛学。1931年至1951代本别北京大学任教。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。晚年定居上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以《特别邀请人士》身份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后被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。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，融汇中西，出入佛道，取精用弘，而要归于儒。其《中体西用》模式对佛教唯识学加以改造，创发以“本体”为本体的哲学体系。

論六經

熊十力 著



熊十力别集

论六经·中国历史讲话

熊十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六经·中国历史讲话/熊十力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

(熊十力别集)

ISBN 7-300-07120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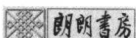
I. 论…

II. 熊…

III. 经学—研究

IV. Z126.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9972 号



熊十力别集

论六经·中国历史讲话

熊十力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2503022

编辑热线:010-82503013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35 毫米 1/16

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张 16.5 插页 2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58 000

定 价 2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回忆父亲熊十力

父亲经常回忆自幼家贫，幼年丧父。随父就读一年，学无常师，只靠自学。他一生著作甚多，少量出版，后来仅靠亲友赞助出版。他最大的希望，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够广为流传。虽然在他晚年，满腹学问无人可传，可他还是坚持写书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父亲去世后，港台陆续出版了父亲的部分著作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新儒学受到各方关注，中华书局等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河北、辽宁、深圳等地出版了他的专著，湖北还出版了《熊十力全集》。

父亲的一生，就是学习和创新、奋斗的一生。

1917年，他参加护法运动，佐孙中山幕。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感，颇觉失望，遂决意弃军政向学，研读儒佛，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。

1918年，他的第一部书《子真心书》整理成集出版，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。

1919年暑，读梁漱溟先生《究元决疑论》，遂从津至北京，两人当面探讨佛学，从而结交成半个世纪的终身挚友。

1920年，入南京支那内学院，学习佛学。在欧阳竟无

论六经·中国历史讲话·……·二

大师门下，深叩内典，专攻法相唯识学，草成《唯识学概论》。读书三年，他在儒、释、道、耶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比较和研究，还钻研了西方哲学。

1922年，经梁漱溟先生推荐，父亲被蔡校长聘入北大讲授唯识学。因不满佛家性寂、因缘、轮回之说，决心自创新说，欲直书己见，逐步走上了自成一家的道路。

1923年，《唯识学概论》重新整理、撰著，是年10月，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之印刷（署名熊子真）。

1924年，更名熊十力，取自沈约《内典序》，是佛典中赞颂佛祖释迦牟尼之语，也有“兴度之业既深，十力之功自远”之说。

1925年，为讲因明学（古印度逻辑学），从秋到冬埋头攻读。次年，他的《因明大疏删注》，由北大印成讲义，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同年，第二种《唯识学概论》印行，他由佛归儒，自创《新唯识论》，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。

1932年9月，经过十年的刻苦钻研，《新唯识论》终于出版，马一浮先生为他作序。

在北大的36年，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阶段，在学术上精益求精，对儒家学说观念的研究有建树、有创新，著作颇丰，培养多位学生成材成名，他本人也成长为知名学者、教育家和哲学家。没有北大，也就没有熊十力的《新唯识论》；没有蔡先生知遇之恩，也不会有熊十力。

父亲一生倡导不断学习，1954年，他在北京什刹海为张中行写下：“每日于百忙中，须取古今大著读之，至少数

页,毋间断。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,更须钻入深处,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。甲午十月廿四日,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。漆园老人。”正是他自己学习的写照。

父亲一生爱国,1902年,他投笔从戎入武昌新兵营,后奔走反清,参加辛亥革命。1937年,七七事变,父亲于7月8日乘煤车逃离北平南下。日军对武汉大轰炸后,1938年春,携母亲及我妹再光入川。先住重庆璧山中学,迁来凤驿,继续研究学术,给邓子琴、钱学熙、刘公纯等讲民族精神、种原及通史。自信日本人不能亡我国家,亡我民族,亡我文化。是夏整理出《中国历史讲话》,约六万言。同时,作有《中国历史纲要》,并与老友居正、方东美交往、讨论。

1939年夏,应马一浮先生之约去复性书院讲学。后遭日寇轰炸,积稿尽焚,衣物全毁,左腿被炸伤。悲愤有余,遂返回来凤驿,和梁先生及他的学生们一起,住在西寿寺破庙中。

抗战时期,生活很不安定,物价飞涨,艰难度日,但他埋头写作,不求名利。他没有一日不讲学,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《新唯识论》,从不灰心丧气。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,四面回响,似催人奋进,总是给人一种勇猛精进、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。

解放后,父亲有幸安心著作,不受运动干扰,他写出了《体用论》、《原儒》、《明宗篇》、《明心篇》、《存斋随笔》等。今天,为了普及新儒学知识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选校了

熊幼光

【论六经·中国历史讲话】……四

目 录

论 六 经

题记	(三)
赘语	(四)
与友人论六经	(一〇)
编者后记	(一二四)

中国历史讲话

题记	(一二七)
缘起	(一二八)
一、种族推原	(一二九)
二、关于修中国通史的意见	(一五三)

中国历史纲要

题记	(二四一)
中国历史应注意之点	(二五四)
编者后记	(二五六)

论六经

题 记

本书作于一九五一年春，并于是年夏由大众书店印行。此据一九五一年印本点校。

赘 语

春初晤友人，欲谭六经。彼适烦冗，吾弗获言，退而修函，知其鲜暇，亦不欲以繁辞相渎。及写至《周官》，念向来疑此经者最多，故今抉择之较详。全文约七万余言，遂名之曰《与友人论六经》。余惟六经遭秦火后，七十子传授真本毁灭殆尽矣。汉兴，偶有出山岩屋壁者，诸儒畏得罪，又窜乱之以媚帝者。如纬书言孔子成《春秋》时，天下血，书鲁端门曰：疾作法。言逮作王者之法也。秦政起，秦始皇名政。书记散，孔不绝。此言书籍尽皆散亡，唯有孔氏春秋，公羊氏世世口相传者，独存而不绝。子夏明日往视之，血书飞为赤鸟，化为白书，曰《演孔图》，中有作图制法之状。孔子仰推天命，俯察时变，却观未来，知汉当继大乱之后，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云云。按汉儒言孔子作《春秋》为汉制法，即本纬书此文。盖汉初《公羊》家以吕政之祸为戒，因造纬书，诡称孔子为汉制法，冀以免害。据此可见公羊寿与弟子胡毋生当汉景帝时所写出之《春秋》，必非其先世口传《春秋》真相，而寿与弟子改写之伪本，凡所为变易以求合于为汉制法之意者，不外拥护统治阶层而已。然有万不可忽者，寿等伪本并未将孔子本义完全毁绝，只是于

伪本中略寓微言。微言后详。譬如以少许金屑杂入沙砾中，非极精检，不易于其中发见金屑也。识此意者始可读《公羊春秋》。《大易》一经，古说以卜筮故，独未焚。然孔子《十翼》，似不无术数家增窜之文，兹不及检出。汉《易》皆术数之余裔，不演孔义。顾亭林戴东原皆不称汉《易》，可谓有识。《诗》三百篇，古说以民间讽诵故得全，然《诗》为孔子所雅言，游夏之徒擅长文学，必于《诗经》之人生观及社会问题多所发挥，别为《诗传》，今俱无存。《乐经》唯《小戴记》有《乐记》一篇，亦稍有增窜，宜简别。《礼经》有《大小戴记》，其间多鸿篇奥义，明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可谓广大悉备，为尼山遗教无疑，然杂入封建思想亦不少，必两戴所增也。《周官》之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本与《春秋》同一体系，而汉以来今古文家并是考据之技，不能究此经义蕴，或信为周公手订，或诋为刘歆伪造，而不悟此经与《春秋》同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，则两家迷谬相等，无长幼可分也。清季治经者，廖平康有为为一派，孙诒让章炳麟为一派，虽两相对峙，要皆不通六经，不识《周官》。孙氏欲以《周官》提倡维新变法，而其所为《正义》，不过杂引古书以供释诂而已，繁抄而炫博闻，徒耗读者目力，是宜简节。张《广雅》注诒让，以抗有为，卒无所发明。炳麟尊孙学，而于《周官》实毫无省发。章学诚方志之业，妄言六经皆史，炳麟袭其唾余，至夷孔子为史家，可哂也。廖康之流，更无讥焉。向曾与友人张东荪言及此，彼亦以余言为然。《尚书》一经，毁灭几尽，其受祸视《春秋》尤烈矣。《春

秋》遥隔万世，理想高远，今人或不信有理想独高之圣人，其实圣人只是不为一身作计，其眼光不拘于近，故能通万世之变。《尚书》立义必与《春秋》有相关联处，秦火后不可考，惜哉！总之，汉人所传六经，确非孔门真本。然求孔子之道，要不能舍汉儒窜易之伪本而别有所考，此余无妄之言。近人严复以孔子为封建之圣人，六经为封建思想。余弟子牟宗三尝言：严复中英人功利之说，于经旨固弗会。斯言良不诬。然复之言，非全未见。汉儒窜易之伪本，如从表面看去，自是封建思想；然慧眼人于伪本中深心抉择，则孔子本义尚不难寻究阐发。佛说有五眼，而慧眼居一焉，治经学者，其可无慧眼乎？汉人言孔子六经有大义、有微言。按微言有二：一者，理究其极，所谓无上甚深微妙之蕴。无上者，如穷究道体或性命处，是理之极至，更无有上。甚深微妙者，非测度所及故，毕竟离思议相故。六经时引而不发，是微言也。不发，谓不肯广演理论，欲人求自得也。二者，于群化、政制不主故常，示人以立本造时通变之宜。立本者，如《大易》《春秋》皆首明元。元者仁也，是万物之原亦治化之本。《礼运》言“天下为公”，公者治本也。《易·革卦》言信，信亦治本也。失其本，不可为治。造时者，《易·乾卦》言“先天而天弗违”是也，秦以后之儒因循不振，久失此义。通变者，民群之思想与制度过时而弊生，必革故取新，是谓通变。如《春秋》为万世致太平之道，必为据乱世专制之主所不能容，故孔子曰“罪我者唯《春秋》”，其与弟子口相传者，亦微言也。大义者，随顺时

主，明尊卑贵贱之等，张名分以定民志，如今云封建思想是也。余以为孔子所修之六经，无非微言，及吕政焚坑惨祸，汉儒怀戒心，始改窜孔经，而以伪本行世，护持帝制，然仍隐寓孔子微言于其中，以待后之能读者，此汉儒苦心也。然伪经表面上几皆大义，微言隐而难知，故严复以封建思想诋六经，亦非无故，独惜其未能抉择耳。余尝欲为《六经索隐》、《大易广传》二书，以发明孔子本义，而迄今未下笔者，因二十年来，每思为《量论》，因明云量者知之异名，量论犹云知识论。将取西洋知识论与佛氏《大般若》、儒家《大易》参研并究，而会归通衢。此业极艰巨，未可粗疏着手。从前大病十余年，继以国难十年，民劳国瘁之感，《诗》云“民亦劳止”，又云“邦国殄瘁”。碍吾昭旷深密之思，《量论》竟不获作，何能别有所事？今兹年力已衰，意兴萧索，传经之愿难忘，著书之趣久短。斯文未坠，后当有悟此者，吾何忧乎？然春初与友人论经一函，于圣人之微言本义确有所发，故商诸大众书局郭大中万鸿年两君，为余印二百余部姑存之。赵君介眉谓此书可为将来评判经学者作一参考，遂由大众付印。刘生公纯安贫好学，酷暑助余校对，用志其劳。王船山诗曰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余得无同感欤？辛卯五月熊十力识于北京西城大觉胡同空不空斋。

附记：民国以来治哲学者，言知识论只求之西洋，其实中国儒家与印度佛家大乘，于知识论虽不必有专著，而二家在东方哲学界知识论方面确是神解超脱，能于西洋谈知识论者所自封自缚而不见为有问题处，

乃皆见为极大问题所在。而二家三字，至此为长句。此是儒佛二家第一奇迹，惜乎今时中印西洋三方治哲学者都不可与语此事。或问：中国哲学何故独举儒家？儒家经籍何故独举《大易》？印度哲学何故独举佛家大乘？大乘经籍何故独举《般若》？答曰：《大易》含藏万有，亦是量论之宗。晚周迄宋明诸子之论，各有偏至，要当折中于《易》。佛家至于大乘，其《大般若经》，空观之极诣也。空观一词之意义深广无边，难以简单之词为注释。古今治哲学者，以意想构画之境当作宇宙实相，易言之，即妄持种种戏论而自计为理实如是，如蚕作茧自缚，如蛛造网自封，迷妄之苦无由解脱，唯《大般若》直将凡夫所有推度虚见与戏论习气扫荡尽净。虚见二字须注意，推度终不与真理相应故。般若境地，高极！大极！深远微妙至极！印度诸外道何能有此诣乎？《易·系辞传》曰“知周万物”，此言知性本自周通万物，非纯由经验而始有知也。而《说卦篇》又云“小辨于物”，则不忽视经验亦可知。然《大易》不以虚见为贵，而贵以其周物辨物之知实现之于人生日用，上下与天地同流，及万物皆备于我之践履中。而贵二字，一气贯至此。所谓“裁成天地，辅相万物”，方是知行合一究竟境界。总之，《般若》、《大易》在量论即知识论。方面，皆能真切探悉问题所在，而不至陷于迷谬。若其穷大极深，诚有非徒逞思辨之哲学家所能喻者。儒佛并于思辨工夫外，更有修证工

夫，西洋哲学家便徒逞思辨。但修证一词，此不及释。西洋知识论，吾未能直阅外籍，然佛氏有言“于一毫端见三千大千世界”，吾就译本而穷其所据，察其所持，推其论之所必至，亦可以控其要而知其所抵之域矣。吾欲出入华梵西洋而为《量论》，胸中已有一规模，然非精神饱满、兴会时发，断不能提笔。人或劝余急写一纲要，其实纲要二字谈何容易。真正著述确是不堪苟且，老而愈不敢苟也。纲要如能作，亦决不同于西洋知识论之内容与体式，自别是一种作意，然暮年意兴消沮，恐终不能作也。